读史札记

清朝获悉土耳其素丹称号时间考辨

钟　焓

17—18 世纪的欧亚大陆现在已被学界从世界史的角度总结为一个陆基帝国蜂起并立以竞相继承早先蒙古帝国遗产的大时代。①在这一基本历史背景下，分别立国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清朝和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彼此对于对方拥有何种程度知识上的了解，自然成了一个极富学术旨趣的话题。试从该时期的清朝一方来观察，由于与奥斯曼帝国相距绝远，没有建立直接的外交渠道，故对于彼国信息的掌握往往需要通过处于中介位置的第三方间接得来，带有明显的转手传闻性质。这种情况清楚地表现在当时土耳其君主正式采用在其本国和欧洲也流传最广的称衔素丹（Sultan）一词长期以来并不为清朝官方所熟知，相反为后者获悉的其君主头衔则是一个指代奥斯曼皇帝的不大知名的称谓—hunkâr/hünkâr 的音译控噶尔/恭喀尔等。②其在词源上来自波斯语 Khwand-kār/Khwand-gār，相关含义为：土耳其皇帝；国王或君主。③该名称明显和波斯语中的 Khwand（“君主，王子”）与 Khudāwand（“君主，国王，掌权者”）有着语义上的渊源关系。

较早清末学人洪钧在对《元史·速不台传》中出现的东欧国名马扎尔（即匈牙利）作注解时，即已首次综合比较了图理琛的《异域录》汉文本和椿园《西域闻见录》中的相应记载，将前者出现的作为君主头衔的“拱喀尔汗”和后者中作为国名出现的“控噶尔”相联系，均比定为匈牙利（Hongarie）的两种译称。④虽然洪氏所作的对音勘同未中鹄的，但他对相关史料的发掘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以后的学者得出下列认识，即清朝正式获悉奥斯曼帝国的有关情况实发端于 18 世纪早期图理琛的出使俄国，而反映其出使经过的《异域录》所留下的拱喀尔汗等译名相应也成为清廷所了解的其国君主名称的开始。⑤此后的伯希和在对《西域闻见录》中关于控噶尔国的记载作注释时同样也只是将该名称在清代文献中的出现上溯到《异域录》内的上述名称。⑥

[收稿日期] 2014 - 01 - 12
[作者简介] 钟焓（1976 - ），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081；zhonghancq@ sina. com
[基金项目] 2014 年度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成果。

① 杉山清彦《近世ユ—ラシァのなかの大清帝国》，收入冈田英弘编《清朝とは何か》，藤原书店，2009 年，第 290—301 页。

② *New Redhouse Turkish-English Dictionary*，Istanbul，1968，pp. 493b，498a. 按该专名在清代满汉文献的写法均未统一，为求行文之便，本文在正文叙述中所采取的汉字音译写法一般为控噶尔/恭喀尔。

③ F. Steingass，*Persian-English Dictionary*，London，1930，p. 489a.

④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435—440 页。

⑤ 关于清朝入关以前明朝对土耳其方面的信息了解分别参看和田博德《明代の铁炮传来とオスマン帝国——〈神器谱〉と〈西域土地人物略〉》，《史学》第 31 卷 1—4 号，1958 年；羽田明《明帝国とオスマン帝国》，收入氏著《中央ァジァ史研究》，临川书店，1982 年，第 349—354 页；[意] 艾儒略原著，谢方校释：《职方外纪校释》，中华书局，1996 年，第 48—50 页。

⑥ P. Pelliot，*Notes Critiques d'Histoire Kalmouke*，Paris，1960，pp. 88—89n258. 中译本参看 [法] 伯希和《卡尔梅克史评注》，耿昇译，中华书局，1994 年，第 138 页注 10。

20 世纪 60 年代首次全文刊布《异域录》满文本译文的日本满学家今西春秋在为书中的恭喀尔汗（Gungg’ar Han）作注时，特地引用该国中亚史学者羽田明教授的观点，否认了该名称与匈牙利有关的说法，但又将此头衔诠释为土耳其语中“罪人”一类的贬义语，并把它的通行原由与正值图理琛访俄期间在位的土耳其素丹艾哈迈德三世（Ahmet Ⅲ）的个人放纵生活或者他庇护瑞典君主查理十二的政治行为联系起来。① 换言之，在羽田氏看来，恭喀尔汗一词只是当时奥斯曼帝国某位君主的个人化绰号而已，远非其国君主通用的头衔，故流行时间也仅限于这位君主执政的特定时间内（1703—1730）。这种解说当然不足为训，正如随后塞诺在 1990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所指出的，土耳其君主正式采用这一称号始于穆拉特一世素丹（1421—1451）。该称衔后来甚至流传到中亚地区，故中亚希瓦汗国君主阿布尔 - 哈齐在 17 世纪 60 年代撰写的《突厥世系》（*Shejere-i Türk*）中专门述及 16 世纪前期哥疾宁的君主曾以控噶尔（khounkâr）汗来代指那时的土耳其素丹。② 塞诺此文还纠正了围绕该名称所出现的其他误解，然而在发掘清代史料上并未超出此前洪钧和伯希和的征引范围，故仍将《异域录》中对恭喀尔汗的叙述视作清朝接触到有关奥斯曼帝国君主名称信息的开始，并进一步发挥出 19 世纪 40 年代编撰完成的柯瓦列夫斯基蒙古语大词典中所出现的将控噶尔（qungγar）解释成土耳其人的释义也最终来自《异域录》的观点。据此可见，他对《异域录》一书在传播有关土耳其的相关知识上所起的作用之重视了。

最近国外学者考察清朝关于奥斯曼帝国认识问题的两篇力作分别出自日本学者小沼孝博与美国哈佛大学马世嘉（Matthew W. Mosca）博士之手。两者的共同点均以对清朝文献中有关控噶尔记载的辨析为中心，并在引征的文献数量上大大超越了前作。其中前者的突出贡献是首次引用译释了乾隆年间的三件满文奏折，论述了清朝继康熙晚期图理琛出使之后，在 18 世纪中叶平定准噶尔之后再度获悉作为汗称和国名的控噶尔（小沼氏给出的相应满文转写作 Khūnkār 等，稍异于此前《异域录》满文本的书写形式）的存在，并得出了清廷在 18 世纪先后通过俄国、哈萨克、浩罕及厄鲁特人等中介因素获悉土耳其方面信息的总体认识。③ 稍后马世嘉发表的长文更是详细梳理了有清一朝对于土耳其认识的各项文献记载，其中所征引的康熙朝史料仍为描述图理琛出使经过的《异域录》和大致反映同一时期史事见闻的揆叙的《隙光亭杂识》。作者也认可控噶尔作为政治及地理术语见于满汉文献记载出现在 1712—1715 年图理琛使团出访俄国和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汗之后。他同时还将康熙晚期对于包括控噶尔这一名称在内的奥斯曼帝国有关知识的了解增多归结为当时清朝与土尔扈特蒙古人发生政治接触这一具体的历史背景因素。④ 单以所谓控噶尔问题的讨论而言，上述新作可谓在研究深度上相比前人有了显著突破，惟在考察控噶尔之名初见于清代文献的时间问题上，均未能超出《异域录》所提供的时代范畴。故综合一个世纪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来看，清朝最早获悉奥斯曼君主名称应归功于图理琛使团出使活动的论断似已得到了学界的广泛承认与接受。⑤

笔者最初考虑这一问题时对于上述论断也未质疑，不过后来在细读《异域录》中所出现的恭喀尔汗内容的过程中，逐渐对此产生了疑问。图理琛的记述中第一次出现该专名是当康熙五十

---

① 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天理大学，1964 年，第 108 页注 114。

② D. Sinor, “Qungγar: a Curious Mongol Appellation of the Turks”, in. *Varia Eurasiatica: Festschrift für Professor András Róna-Tas*, Szeged, 1990, pp. 165—166, 168.《突厥世系》一书现已有中译本出版，参看阿布尔 - 哈齐 - 把阿秃儿汗《突厥世系》，罗贤佑译，中华书局，2005 年，第 203 页。

③ 小沼孝博《“控噶尔国”小考》，收入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编《民族史研究》第八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54—158 页。对相关满文奏折的翻译也参看野田仁《露清帝国とカザフ = ハン国》，东京大学出版会，2011 年，第 137 页。

④ Matthew W. Mosca, “Empire and the Circulation of Frontier Intelligence: Qing Conceptions of the Ottoma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70 No1. (2010), pp. 155—158. 笔者获悉此文系出自小沼孝博先生的热情指教，在此特致谢意。

⑤ 由于记叙此次出使经过的报告出自图理琛之手，人们一般习惯上即将该次清朝出使团队简称为图理琛使团。不过根据现存的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当初图氏在使团中的地位仅名列第三，并不特别显赫。参看马大正、郭蕴静《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民族研究》1984 年第 2 期。

二年（1713）七月初四清朝使团抵达托博尔斯克时，俄国西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公爵对于使臣介绍俄国的邻邦情况如下：

不但我俄罗斯国，观天下诸国：沙漳汗、恭喀儿汗、西费也斯科国、厄纳特赫国、哈萨克、哈拉哈儿叭国、策旺拉布坦、阿玉奇等国，皆互相争斗，独中国甚是宁谧。①

根据相关学者对于以上国名的注释，可知沙漳汗是指当时伊朗的君主，西费也斯科是指瑞典国，厄纳特赫国即印度，哈拉哈儿叭则是里海一带过着游牧生活的黑帽突厥人的名称 Kara Kalpak 的音译。② 比较上述有关专名，可知有的如西费也斯科（Sweden）明显是出自俄方译员之口，而被清人直接音译记录下来，因其带有俄语表示国名的后缀 - sko。同理哈拉哈儿叭也是俄方人员直接把该突厥部族名称的读音告诉图理琛一行。与它们不同，像《异域录》所记录的表示印度的厄纳特赫（《异域录》满文本作 Enethe）一名却不是俄语对于印度的称谓，而是来自满语指代印度的固定用词 Enetkek 的略微讹变的形式。③ 也就是说，《异域录》的作者基本准确地把俄语中表示印度的词语转译成满语中的对应名称，从而让通晓满语的读者能够正确地理解其意，只是后来当《异域录》的满文本被进一步翻译成汉文本时，却仍旧采取音译方式，没有意译成清代汉人多能明白的印度一名。那么，我们下面需要思考的问题是，所谓恭喀尔汗的名称又是属于上述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呢？

在《异域录》的后面部分中还出现了三处“图里耶斯科国的恭喀尔汗”（满语作 Turiyesko Gurun i Gungg’ar Han），也多发生在俄方人员向清朝使者陈述其时俄土局势的语境下。④ 虽然此处图里耶斯科的满文形式表现出其明确出自俄方译员之口，但恭喀尔汗的用法却不像是清使亲耳从俄方人员口中听到并转录下来的，因为俄语中历来惯用素丹（Султан）一词作为土耳其君主的正式称呼，而不致使用带有内陆亚洲政治色彩的某某汗来称呼前者。这就像《异域录》中在记载俄方向清朝人员通报己方君主时，均采用的是察罕汗一名，其实该名称并非俄方人员对沙皇的习惯称谓，而是清朝一方同时还包括当时内陆亚洲的许多突厥 - 蒙古语民族指代俄国沙皇的固定用语。⑤ 从这一角度上思考，恭喀尔汗就应该如同察罕汗和上文中指代印度的厄纳特赫一样，也是一个在当时的满语中业已流行的指代土耳其君主的固定名称。这就是说，当时的清朝使臣准确地把从俄方人员之口说出的素丹翻译成了满语中的恭喀尔汗。此种情况暗示，尚在图理琛使团与俄方接待人员交谈接触以前，清朝就已经明确使用恭喀尔汗来代指奥斯曼土耳其的最高统治者。

基于这一基本分析思路，笔者翻检浏览了若干反映图理琛出使之前清朝与其相关邻邦交往的记载，结果发现其中的一则材料足以确凿地证实以上推断的正确性。这则史料出自造访清朝的俄国使者斯帕法里（N. G. Spathary）对其在 1676 年（康熙十五年）逗留北京期间的陈述报告，有关内容在 1906 年得到刊布。熟谙俄文资料的英国学者巴德利（John F. Baddeley）遂将斯帕法里访华报告的主体译为英语并收入其在 1919 年推出的巨著《俄国·蒙古·中国》的下卷中，与本文主旨有关的内容见于斯帕法里在当面批评清朝接待官员低估俄国沙皇的赫赫威名时所道出的一通强硬的外交措辞中：

---

① 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满文上卷 71a—b，汉文 31a，又今西氏根据满文部分作的相关直译参看同书第 193 页，比较满汉文本可知，两者对上述内容的叙述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细节差异。

② 有关注释参看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第 107—108 页；G. Stary，*Chinas Erste Gesandte in Russian*，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76，pp. 69—70. 此外也有学者将沙漳汗推论为中亚的希瓦汗国，此说参看柳存仁《关于图理琛的〈异域录〉》，《中国文化》第十九、二十期，2002 年，第 246—247 页。

③ 满语中指代印度的这一专名又借自蒙古语的相应词汇，参看 E. Hauer，*Handwörterbuch der Mandschusprache*，Wiesbaden：Otto Harrassowitz，1952，p. 251.

④ 今西春秋《校注异域录》，满文下卷 24a，汉文 50a；满文下卷 58b，汉文 65b—66a；满文下卷 64b，汉文 67a。

⑤ 关于察罕汗（白色君主之义）的来历，参看 M. Khodarkovsky，*Russia’s Steppe Frontier：The Making of a Colonial Empire. 1500—1800*，Indiana Univ. Press，2002，pp. 44—45，243n125.

大使（按指斯帕法里本人）回复说“我们十分清楚达赖喇嘛和卡尔梅克、蒙古、布哈拉及其他首领是什么样的君主，因其均与我国为邻。另外葡萄牙人和荷兰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果可能的话你把你曾提到的所有遣使到过中国的那些君王的国度再加上更多的国家——你也挑不出一个国家会有我们的沙皇陛下的国度那样强大。上帝保佑，他拥有至尊无上的权力。（你们的）博格多汗却将沙皇陛下送出的国书与使者与区区葡萄牙、荷兰等相提并论，这就尤其不够友好。如果是罗马的皇帝（Caesar）或者是被你们称作 *Hunkar* 的土耳其素丹遣使来到中国的话，或许可以说他们（代表的）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君主；不过考虑到我们互为邻邦，因此就（对贵国）的重要性而言，即使他们也不能和我们的君主相比。此外，作为邻邦，彼此之间不应冷淡相待……”①

斯帕法里所作的此番陈述非常清楚，他完全知晓那时负责接待自己的清朝理藩院中的满族官员已将土耳其素丹明白无误地称之为 *Hunkar*，虽然后面没有加上汗的头衔，而这一名称无疑就是土耳其语中的 hunkâr/hünkâr，同时也即后来 18 世纪《异域录》中的恭喀尔（Gungg’ar）和满文档案中的控噶尔（Khūnkār 等）。看来至晚在 1676 年，虽然清朝并未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发生过官方通使关系，但官方已经习惯使用控噶尔这一名称指代这个位于遥远西方的帝国君主了。而此时尚在图理琛使团 1712 年启程访俄之前 30 多年以前。这就直接印证了本文前面的判断:《异域录》中出现的恭喀尔汗一名其实只是图理琛袭用的满语中的一个固定用语而已。

同时由斯帕法里提供的这一证据也对我们判断清朝一方获悉土耳其君主称衔的途径提示了新的思路。此前马世嘉曾进一步将清朝获知包括控噶尔名称在内的相关知识信息置于前者与土尔扈特人交往的历史大背景下观察，这种考察视角现在看来也有重新调整的必要。因为清朝与土尔扈特人的交往大致是从阿玉奇之侄阿拉布珠尔在康熙三十七年（1698）前往西藏之后开始的，阿拉布珠尔随后因归路被准噶尔部阻断而转投清朝并接受后者的相应安置。以后阿玉奇又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继续遣使东来，直到 1712 年方抵达北京，受到了清帝的礼遇款待，由此又引发了随后的图理琛使团的回访行为。② 故清朝与土尔扈特发生交往的时间大大晚于 1676 年。可以说，同样早在清朝官方接触土尔扈特人员之前，土耳其君主的头衔名称即已为清朝一方所获悉。因此，马世嘉的判断仍然不免存在失之于晚的疏漏。那么清朝最有可能是通过何种途径较早察知控噶尔之类的名称的呢?

从康熙前期清朝与西方邻境的交往途径上看，我们还是倾向于认为西域及中亚的穆斯林在将控噶尔之名传入清廷的过程中扮演着中介者的角色。首先不应忘记，此前提及的《突厥世系》中已经证实中亚世界在 16 世纪已经流行使用控噶尔汗来指代土耳其素丹，由此可见这种用法在该地域出现的历史颇为悠久。以后直到 18 世纪前期，据称哈萨克的首领仍将控噶尔（Kondaker）和中俄两国的君主以及准噶尔汗国的统治者共同看作支配世界的伟大君主们。③ 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当归于中亚地区长期以来习惯援用汗这样的政治头衔称呼世界上的各大君主。正如他们通常将清朝皇帝和俄国沙皇分别称作厄真汗（Ejen Khan）和察罕汗，土耳其君主正式使用的带有伊斯兰教政教合一色彩的称号素丹在这里也让位于控噶尔汗这样更富内陆亚洲政治色彩的名称。而

（下转第 128 页）

---

① John F.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XⅦ*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A. D.* 1602—1676, Vol. Ⅱ, London, 1919, p. 330. 中译本参看［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二册，吴持哲、吴有刚译，商务印书馆，1981 年，第 1459 页。本文给出的译文在表述方面与之微有差异，而在后者的译文中，hunkar 被未加注释地音译成洪豁尔。

② 乌云毕力格、成崇德、张永江《蒙古民族通史》第四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187 页；张维华、孙西《清前期中俄关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 年，第 187—188 页。

③ Jr F. Fletcher, “China and Central Asia, 1368—1884”, in. J.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 Press, 1968, p. 360n88. 按 Kondaker 的写法更接近于控噶尔一名的波斯语原型 Khwand-kār/Khwand-gār。

也就 16000 件。军机处录副奏折中来自京内各部的情况如此，朱批奏折中仍按责任者查询各部并去除盛京五部侍郎、兼任督抚、学政、考官等情形，仍排除与地方督抚等大员会同上奏情况，如搜索责任者包含“吏部”且不包含“盛京”、“总督”、“巡抚”、“学政”、“考官”，然后再去除与地方督抚会奏情形，然后得到各部奏折大致数据如下：吏部 1140 件、户部 1490 件、礼部 720 件、兵部 1100 件、刑部 950 件、工部 450 件，总共 5850 件（清末改设或新设各部，朱批奏折非常少，一般几件，多的有数十件，总数也不过几十件，基本不影响总数）。以上宫中朱批及军机处录副中包含的各部衙门的奏折、录副奏折数量与内务府相比要多一些，总共 20000 多件，与各部衙门所上奏折 20 多万件的总数相比，占比在百分之十左右。

以上对于朱批、录副奏折的统计，还是有些不够精确的地方。首先，并不是存世的奏折都包含在一史馆系统数据库里，但大部分都在。其次，宫中朱批奏折、军机处录副奏折档案中并不全是奏折类档案，也有不少的单、咨文及其他文书，但大部分是奏折类档案。再次，朱批奏折与录副奏折会有重复，依照奏折处理的流程来看，这个重复的比例可能不小，另外，不少检索项之间也有交叉的地方，影响了数据的准确性。但是，总的来说，以上都不会严重影响数据的数量级，应该不会导致改变大致比例，而且从最后一点来说，是有加大朱批奏折、录副奏折中所包含内折数量的作用的，这样看来，占比百分之十左右的论断，不至于低估。

明了朱批奏折、录副奏折的构成，知晓其中京内部院衙门所上奏折数量甚少的状况，我们在研究搜集资料时才能有的放矢。如果我们要寻找清代各部院对地方事件的议覆，中央政策的出台等问题，应更多向部院档案中搜寻。但是，由于光绪庚子辛丑年间八国联军侵华造成的劫难，部院衙门档案中保存的光绪二十六年以前的数量较少。那么研究者除了查阅各朝实录、《东华录》等编年史书以外，对当时的京报、官报、公报、各衙门奏疏公牍，《东方杂志》、《申报》、《时报》等近代报刊，及其他当时的典籍资料恐怕得更加关注。

（上接第 104 页）

前引小沼氏论文所引用的满文档案同样证实了降至 18 世纪中后期，哈萨克和浩罕的君主仍继续沿用控噶尔汗的称号指代奥斯曼皇帝。值得注意的是，斯帕法里滞留北京期间曾打探到被他称为布哈拉人的中亚和西域的操突厥语穆斯林商人使团在 1675 年抵达北京后又在返程途中因战争冲突受困于张家口的消息；他甚至还有机会亲自会晤了一位原籍吐鲁番的所谓布哈拉人，后者向其具体描述了从中国内地经吐鲁番前往撒马尔罕最终抵达俄国境内的阿斯特拉罕的行程费时情况。①

综上从这位俄国使臣提供的报告来看，早在康熙前期，西域和中亚的穆斯林客使商团前往北京已是司空见惯之事。故从这一历史背景上分析，他们将有关土耳其素丹称号的知识信息顺便告知清朝接待人员也是自然合理的结果。当然关于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将来清初档案文献的整理刊布工作；而目前我们不妨暂作如下的初步结论，即约在 17 世纪下半叶，清廷已经通过相关中介渠道了解到土耳其君主被称作控噶尔之类的知识信息。这一点适足修正过去流行的那种认为清朝直到 18 世纪才开始对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具有一定认知的传统观念。

---

① John F. Baddeley，*Russia*，*Mongolia*，*China*：*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XⅦ*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 A. D.* 1602—1676，Vol. Ⅱ，pp. 365—366，376；［英］约·弗·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二册，第 1510、1524 页。